

CC 常青藤译丛

Academic Duty



[美] 唐纳德·肯尼迪 著
阎凤桥 等译

学术责任

新华出版社



常青藤译丛

Academic Duty

学术责任

[美] 唐纳德·肯尼迪 著
阎凤桥 等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责任/(美)肯尼迪著;阎凤桥等译. -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2

(常青藤译丛)

ISBN 7-5011-5494-5

I.学… II.①肯… ②阎… III.高等教育—作用—研究
IV.G6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9435 号

Academic Duty

Copyright © by Donald Kenned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学 术 责 任

唐纳德·肯尼迪 著

阎凤桥等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625 印张 270 千字

2002 年 2 月第一版 200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494-5/G·2008 定价:23.80 元

编者序言

《常青藤译丛》是本社推出的一套思想文化类丛书。其名称和主旨皆受到以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为主体的“常青藤联盟”Ivy League 的启发。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享有崇高学术盛名的联盟，该联盟致力于“树立标准、展示理想、坚持价值”。多年来，它以追求理想的激情和探索现实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探求新思想、新事物、新价值，倡导自由探索、自由审视和自由创造。

《常青藤译丛》是一套力图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以全球性的眼光推介外国前沿思想文化成果的丛书。我们将分辑出版，陆续为读者推出。第一辑共四本，它们是《敲开智者的脑袋——当代西方 50 位著名思想家的智慧人生》〔英〕约翰·雷契著、《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美〕劳伦斯·哈里森、塞缪尔·亨廷顿主编、《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德〕哈拉德·米勒著、《学术责任》〔美〕唐纳德·肯尼迪著。

《敲开智者的脑袋——当代西方 50 位著名思想家的智慧人生》是关于从结构主义到后现代性理论的一本书。作者约翰·雷契在书中介绍了现代极具影响力的 50 位著名思想家。其中包括尼采、弗洛伊德、德里达、利奥塔和卡夫卡等人。为了便于读者

理解各个时期思想理论及其影响，作者特在每部分前写有一个简短的导言性评述。此书不仅是理解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重要参考，而且对于希望更多了解本世纪最重要的知识革命的读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好书。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是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思想家亨廷顿参与主编的一部书。本书从文化与经济发展、文化与政治发展、文化与性别、文化与美国少数民族、亚州危机和促进变革等七个方面论证并阐述了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回答了文化价值观是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的。由埃通加·曼格尔在书中提出的一个命题，“文化是制度之母”可以说是本书的点睛之笔。

《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的作者哈拉尔德·米勒是一位极具权威的批评家。他不仅针锋相对地反驳了亨氏文明敌对论的全球观，而且向我们警示，简单地渲染或者接受这种片面的世界观或敌对论是极其危险的。作者明确指出：不是文化的对抗，而是文化的共存与对话；国际社会必须更多地尝试进行合作，而不是简单地对抗；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仅应该保持，而且应善加利用。只有对各种文化表现出宽容，全球的和平共存才可能得以实现。虽然国际现实政治的发展似乎证明了亨廷顿理论的某种预见性，但哈拉尔德·米勒的理论仍然具有现实价值。我们不妨将塞缪尔·亨廷顿和哈拉尔德·米勒的看似对立的理论观点看作同一命题的合题——这样两位思想家就在智性和善性的目的上汇合了。

美国学者亨廷顿和德国学者米勒从“文明冲突”和“文明共存”的视角考察当今世界的大趋势，提出了文明分析的世界框架，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讨论、关注和反思。“文明冲突”是文明发展演进的动力，文明共存是融合各种文明不同的特质、扬弃不合适宜文明，形成多样化的新的文明体系。文明共存中必然有文

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中包含着文明的共存和融合。文明在产生同一性的同时也必将产生多元性，两者密不可分并互为前提，是辩证统一在一起的。历史上每一次文明冲突的结果往往是进一步形成文明共存与融合，而每一次经过文明共存与融合产生的新的文明又会孕育着更为深刻的文明冲突。文明冲突和文明共存引发世界文明的变迁、演进、发展和多样化，不同文明在交融中发生碰撞而走向整合。

《学术责任》的作者在斯坦福大学做过多年校长、现在仍在该校执教的唐纳德·肯尼迪无疑是著述此书的最佳人选。他以学者和大学校长的双重身份，从学术责任的高度首先阐述了如何影响未来大学，如何恢复大学使命和忠诚的价值观的问题；其次，作者论述了大学至高无上之处在于给人类提供改良文化、创造文化、延续生命和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智力平台。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

如果说，人类思想文化是智慧的结晶、进步的阶梯、文明的象征，那么上述四部著作就成为反映当代思想文化深度和成果的最好文本。

文化和思想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德谟克里特说：智慧生出三种果实：善于思想、善于说话、善于行动。告别了20世纪和经历了20余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历史和现实给我们提出了更深层的课题，为了实现中国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一方面我们固然需要从优秀的传统文化汲取精华，与此同时，还要从全人类文化的宝库汲取思想文化的营养——这就是编译出版《常青藤译丛》之目的。

前言

(英文版)

1993年，我在卸任斯坦福大学校长职务后，又重新回到教师队伍之中，那时我就决定为有志步入学术职业生涯的在学博士生开一门相关的研讨课。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研讨班的学生们提出了一些与高等教育以及他们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所处位置有关的问题，并进行了辩论。他们表现出的过人精力、崇高使命感和智力品质，都极大地鼓舞了我，使我对高等教育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同时，由于他们对于大学组织以及各种人事和即将面临的学术职业挑战还不够熟悉，这都给他们认识与学术职业有关的问题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过去我曾就其中一些问题，写过一些短文，包括教学和如何评价优秀教学成果；学者在评审别人工作时遇到的伦理性问题；研究工作及其如何获得资助；学者承担的外部使命；甚至研究中的不端行为。

与学生们一起研讨这些问题的经历告诉我，那些未来的学术人员是一个更大的读者群，他们也可能会从我们当时讨论的问题中获益。这种信念在第二年研讨课进行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加深。上课的学生们为获得博士后选人资格的学生，设计了一份关于他们个人经历以及想象中应该承担的学术责任的调查问卷。从70名斯坦福大学学生中收集得到的最初调查结果表明（调查样本后

来扩大到了其他一些学校)，伴随着对未来学术生涯高度的信心，是他们对教学、大学管理和学术生涯其他方面表现出的彷徨和困惑。

在研讨课进行期间，公众对于高等教育的关注程度有所提高，一部分原因在于诸如种族冲突、校际体育比赛丑闻和研究不端行为等问题的曝光，另外，公众对于学术成本和质量所抱有的疑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未来的教授对于大学的目的和组织尚感到不确定的话，那么又怎么能够期望公众对于大学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呢？如果他们不了解大学及其责任，他们又如何为其提供资助呢？

因此，最初为一群学术职业渴望者准备的讲课笔记，就在这种想法驱使下，扩展成了一本关于大学的著作。基于这种情况，本书反映了著者对首批听课者的关注。我试图从学术责任的高度，影响未来的大学老师，它包括把学生放在第一位，重新恢复大学使命和忠诚的价值观。这向著者提出了更为艰巨的任务：向范围广泛的公众叙述现代大学的复杂性以及它所面临的挑战。

我极力想坦率地正视美国现代高等教育中存在着的不足，我希望我没有从消极方面影响人们对高等教育事业所抱有的信心。相反，我认为现代美国大学是十分成功的。虽然它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它与丘吉尔的民主制没有什么两样。近期出版的大量由大学校友撰写的通俗读物并没有严肃地诊断出大学存在问题的症结，更没有提出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比较值得称道和有一定思想性的出版物是亨利·罗索夫斯基所著的《大学：管理者手册》，它描述了大学的实际运作情况。我的这本书主要是为大学教师撰写的，内容包括他们在学校使命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他们如何与大学的拥有者和管理者发生联系以及他们对学生所承担的责任。

我所选定的本书题目，即《学术责任》，它和学术自由是一

对范畴，学校自由是大学中永久性的讨论话题。但是人们却很少谈到责任问题，原因是教师所从事的工作是一种编码程度低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看，大学是一个缺少规则的特殊团体。事实上，他们的表现相当不错，但是，另一方面，在围墙内进行的许多活动，对于外界来说，简直就像是一个谜。信息不足危害了大学向外界做出解释的能力，强调大学应该对社会做出解释，我认为与日益高涨的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不满意是密切相关的。处理问题的最好良方是持同情心的理解，我希望读者在读完此书后，对于上述观点的认同感比读此书之前有所增强。

对于未来的教授，我想说的是你们将开始一种充满乐趣和挑战的新生活，不难发现这是现代大学最重要的使命。大学至高无上之处在于给人们提供了机会：它给人们提供了改良文化、延续生命和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个人和智力平台。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

前言

(中文版)

非常高兴地看到《学术责任》的中文版即将出版。我希望这对说中文的大学教师、学生和学术管理人员有所裨益。

这本书源自我在斯坦福大学给研究生开的一门研讨课。那些研究生都在博士班学习，而且打算从事学术职业。讲授这门课的原因是我觉得我们在培养年轻的学术接班人时偏重于他们各自的学术领域，却忽视了那些让他们成为成功的负责任的学术公民所必需的其它知识和技能。

令我惊奇的是，我发现我的学生对这些问题非常感兴趣。比如说如何管理大学、大学之外的哪些力量会导致利益冲突、绩效如何评估、怎样出版和评价学术著作等等。我们在课堂上探讨了所有这些以及其它问题。在我讲这门课两年后，我决定就此问题写一本书。

在美国，学生和老师都认为这本书很有意思并对他们有帮助。我也经常接到索要本书的请求，并回答大学管理人员就本书提出的问题。但是，当有人提议为其它国家的读者翻译此书时，我想了解，由于本书并不着重讨论美国的学术文化，其它，具有不同学术传统的国家会不会觉得本文的参考作用有限。

我在其它地方的访问最终让我确信，各国的差异并不是那样

大。那些在其它地方接受教育的美国大学老师以及在其它国家学习一段时间的美国学生的经验进一步表明，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在世界各国是共同的。因此，美国年轻学者所面临的问题也许同样困扰着其它国家的学者。我至少希望如此。

自从《学术责任》出版以来，我的同事就时常问我这样的问题：“假如你现在写这本书，你还会强调这些事情吗？会不会有些不同？”写作这篇序言给我提供思考这些问题的机会。我认为，大多数问题依然存在。这本书依然具有和当初一样的现实意义。

但是，通过过去五年的经历，我会更加强调某些问题。去年，我担任《科学》杂志的主编。这本杂志是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周刊。虽然《科学》在美国出版，但这本杂志享有很高的国际声望，收到世界各国实验室的研究报告。在《科学》上发表文章被认为是重要的学术成就，其它国家对此也许更为看重。比如，我注意到，一些国家的政府给那些在《科学》或其它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科学院给予奖励、奖金或提供其它便利。

在写作《学术责任》时，我提到学术作为一种竞争性活动，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我的经验表明，这种现象现在越来越明显。这不仅仅表现为学术和商业活动日益密切的联系，而且学校晋升和其它奖励也越来越注重学术声望。因此，我对这种奖励制度给一些科学家带来的冲击非常担忧。他们匆匆忙忙地发表文章，尽管那些文章没有很好地完成。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竞争还影响到作者之间如何进行交流。现在，科学家拒绝和其它学者交换资料已经司空见惯。作为杂志的编辑，我感到有些现象令人不安：杂志评审人对他人文章过分地苛评，有时还会不恰当地使用他们所评审的材料。作者总是过分引用他们自己的文章。这可以理解，也情有可原。但是一稿多投，或者有意忽略那些对自己的研究结论不利的研究发现，却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些有违学者形象的现象并不普遍，但却超过了应有的限度。我希望，《学术责任》的出版可以提出这些问题供大家讨论，尤其对那些正在接受高级专业训练的年轻学者。经验表明，在美国，年轻科学家的导师很少提到这些事情。毕竟这是一些棘手的话题。

但是，就为学术生涯做准备而言，没有什么事情比正当的学术行为更为重要的了。如果本书对这点有帮助，那它也就实现了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唐纳德·肯尼迪

2001 年 8 月

学术责任

目 录

编者序言/1

前 言(英文版)/1

前 言(中文版)/4

1. 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3

2. 培养的责任/31

3. 教学的责任/75

4. 指导的责任/119

5. 服务的责任/145

6. 研究发现的责任/183

7. 学术成果的发表/231

8. 诚实/261

9. 走出围墙/303

10. 变革/329

后 记/353

第一部分

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

1

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

在大学里，人们经常听到“学术自由”这个词，好像它是很神圣和庄重的字眼。尽管只是从 20 世纪初期人们才开始使用这个词，但它又似乎始终与我们同在。和它的重要性一样容易被理解的是，学术自由是指教授和他们的机构团体独立于政治干涉。正是学术界——而不是美国生活的其他领域——维护这样的权利，即异端思想和非常规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

在 20 世纪，已经证明这种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在 50 年代初期出现反共情绪期间，为了解除那些被认为是“非美国的”组织（即同情共产主义目标的组织）成员的大学教师的职务，国会的各委员会，特别是在威廉·詹纳（William Jenner）任主席的众议院和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任主席的参议院，给大学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校长们和大学管理委员会勇敢地面对这种压力，同时，学术自由的传统也给大学增添了抵制这种压力的力量。因此，对于学术界的人而言，这一传统维护了学术实验的宝贵空间，即为学术实验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

事实上，这种自由进一步地延伸，就是允许具有非同寻常创造性的人享有非同寻常创造性的生活。的确，学术自由意味着松散的结构和最低程度的干涉。在学术努力的方向上，或者甚至是在所要进行学术活动的场所中，不仅没有时间的限制，而且只有

很少的关于努力方向或学术工作场所的规定。学术工作和其他行业的工作是如此不同，以致于我们发展出一对非正式的词汇来描述它们之间的差异，即称学术领域为象牙塔，而称其他一切别的领域为真实的世界。

与学术自由互为补充和对应的是学术责任，但后者却鲜为人用。在我们这样的民主社会里，这二者被视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谈到个人自由与群体责任之间的对称与均衡关系时，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表述地很好：“自由和责任，权利和义务，它们是交易的关系”。

这的确是交易。但是，在我们如此自由地谈到学术自由时，为什么学术责任听起来是那么不合乎惯用的说法呢？这种差异集中于一个重要的悖论。一方面，目前美国的高等教育非常强大和成功。与此前相比，它为更多的人服务，而且比任何时候服务得更好。它建立了一套国际标准，把世界各地的学生吸引到这里来。它支撑着世界上最强大的、以大学为基地的研究系统。而且，它被许多人认为是对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革新孵卵器。然而，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批评却也变得越来越尖锐和刺耳。这些攻击来自各个方面，既有左翼势力，也有右翼势力。攻击的内容涉及各种不同的主题：科学和政策研究不能提供给我们非常需要的答案（艾滋病为什么不是一个过去的事情？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为什么状况不佳？）；大学生指导质量欠佳（为什么 Susie 的微积分老师不能说和 Susie 一样好的英语？）；不能适当回应经济上的银根短缺状况（各地的公司都在缩小规模；高等教育的生产率为什么没有改进？）。学术界已经觉察到这些攻击，其士气也已降低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有证据表明，在社会对大学的期许和大学看待它自身的方式之间存在着不和谐。因为，尽管人们理解了自由对于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必要性，并且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它，但是，与之对应和平